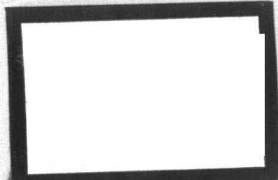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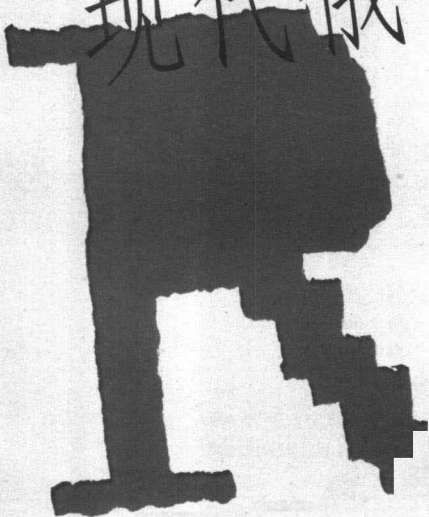
现代俄国文学史

〔美〕马克·斯洛宁 著
汤新楣 译



〔美〕马克·斯洛宁 著
汤新楣 译

现代俄国文学史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俄国文学史/(美)马克·斯洛宁著;汤新楣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8

ISBN 7-02-003432-2

I. 现… II. ①斯…②汤… III. 文学史-研究-
俄罗斯-现代 IV. I51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053 号

责任编辑:胡允桓 李明生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周小滨

现代俄国文学史

Xiandai Eguo Wenxueshi

(美)马克·斯洛宁 著 汤新楣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432-2/G·51

定价 20.00 元

出版说明

《现代俄国文学史》原版为英文本，书题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作者是马克·斯洛宁(Marc Slonim)。现据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中译本修订出版。

斯洛宁是当代研究俄国文学的权威。他原籍俄国，早年在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十月革命后即因与新政权格格不入，开始其流亡生涯；最初，他任教捷克布拉格的俄国大学，后来迁居巴黎，从事著述；一九四一年到美国，在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讲授俄国文学及俄罗斯文化问题，后任教于纽约萨拉·劳伦斯女子学院。

本书主旨在于叙述并分析六十年来自契诃夫以迄二战后俄国文学的演变，但作者认为，要明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必须也要多少了解那一时代的艺术与文化的发展情形。所以斯洛宁在本书中除去分析这一时期内俄国各文学家的造诣和价值以外，对于这些作家所代表的艺术潮流，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都有相当详尽的剖析，同时也兼论到足以反映民族精神与生活方式的哲学、宗教和社会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重点虽在文学史，但却可以当做一部现代俄国文化史来读。

本书作者虽然对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文学持不同观点，书中的有些论述也不全然正确，但作者对这一时期俄苏文学的

叙述尚能保持比较客观的态度,也有认真的评价。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读者了解这一时期的俄苏文学有所裨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三月

目 录

第 一 章	民粹主义运动	1
第 二 章	乌斯宾斯基、加尔洵与萨尔蒂科夫	20
第 三 章	乡土派小说家与贵族诗人	39
第 四 章	契诃夫	55
第 五 章	现代主义运动	81
第 六 章	神秘主义者、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者 ..	106
第 七 章	高尔基	129
第 八 章	一九〇五年及以后	159
第 九 章	布洛克与象征派	192
第 十 章	象征主义派	224
第 十一 章	革命与内战	249
第 十二 章	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及当代文化 教育组织	262
第 十三 章	新经济政策阶段之文艺趋向	283
第 十四 章	塞拉皮翁兄弟会及同路人	304
第 十五 章	浪漫主义之回光返照	334
第 十六 章	从五年计划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363
第 十七 章	稳定时代	398
第 十八 章	爱国战争与战后	424

第一章 民粹主义运动

—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化及社会史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源起彼得大帝时代以迄一八五四至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役；(二)诗歌、散文、艺术与科学即含蕴于此改革前时代。

一八六一年之解放农奴以及其后政府在行政、司法、军事及教育部门之改革，表明一个新世界之兴起。近代俄国即在这一时代开始，后来几十年历史改观的种种问题，推动力以及愿望，都是从六十年代帝俄之重大变化中产生的。这个过渡阶段的重大影响，与美国南北战争后之重大影响相仿。

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一八五五——一八一年)，政治、社会、艺术及思想格式焕然一新；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之工艺及经济扩展使资本主义得以滋长；新一代的建设及革命者多方面表现出他们的积极与热忱。

社会各阶层在文化上都欣欣向荣，一般人渴求学识及行动，希望上进，西方化也同时在加速进行，科学及文学方面也都有新趋向——凡此种似乎使人有理由对前途作最乐观的憧憬。

然而封建农奴制度的残余犹存，大众的生活水准低得不可想象；课税以及补偿所分土地的价款——也就是他们获得解放的代价——成为农民的负担，农民被视为社会上的下等人；阶级

仍分得清清楚楚；政府仍然专权，强横，溺职成习。沙皇及大臣拒绝另立宽大宪法之后，知识分子的幻梦乃成一空。迨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段，知识分子大胆的希望显然毫无基础，他们于失业不满之余对政府遂猛烈批评。政府鉴于反对者声势日张，遂以让步与压制相间行事，官僚政治作风，警察之横行，深受欢迎之作家之被捕，激怒了年轻人，使他们择取强烈手段。一八八六年一个名叫卡拉库佐夫的学生企图行刺沙皇不果而遭受处决，这件事使得反对势力更加加强。

一八六六年至七二年之间社会主义思想大为流行，在大学生中及中下阶级知识分子里尤甚。当时所有大批评家及社会学者——赫尔岑(Herzen)、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毕萨列夫(Pisarev)、拉伏罗夫(Lavrov)、巴枯宁(Bakunin)以及若干新闻界人物都倡导社会主义；其他人士则仅对于社会主义表示好感。一八六一年后许多俄国男女留学异邦，在巴黎、日内瓦、海德堡及波恩等地方遇见从西伯利亚逃出并逃往外国以避沙皇压迫的流亡分子。他们于是在欧洲各地组成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小团体，热切聆听关于社会情况的演讲而且讨论俄国的前途。

有的并且组成印刷厂，把书籍与小册子偷运入俄国。七十年代开始时，社会主义宣传在俄国声势已经不小，这种运动里最重要派别的领导者就是彼得·拉伏罗夫与巴枯宁。

彼得·拉伏罗夫(一八二三——一九〇〇年)是位科学家及革命分子，生平著作甚多，一八六八年他以密尔托夫的笔名开始在某月刊上发表《史论》(*Historical Letters*)多篇。次年《史论》的单行本问世，当局禁止发行，可是警察去书店搜书时却一本也找不到，原来已经销罄。拉伏罗夫当时身任圣彼得堡炮兵学校的上校衔哲学教授，被捕之后充军西伯利亚。未几他逃往巴黎，

就此终身寄居斯土。《史论》之成功是新时代的预兆,它离开了侧重自然科学的虚无主义,转入以注重社会问题为主的民粹主义。

拉伏罗夫认为文化之一切进展都是靠千万人士以血汗辛苦,使得少数特权人士有机会从事研究并且创造。他向青年知识分子呼吁,力主他们所以能在艺术及知识上有所享受,完全得力于这群人。少数无忧无虑的人所以能够培养哲学、文学以及崇高情操,是因为占大多数的吃苦的人被迫凿石铺路、挖掘隧道、耕耘田地与采煤,他们这种无声无息的劳动建立起了学术与美艺的堂庙,然而贫苦而又不识字的人民却不能进去。凡是认识文化是这种代价得来的人,应该致力教育这些人使他们获得解放。他主张必须建立一个终止压迫榨取等等现象的新政权,使人人得受文化。拉伏罗夫相信劳动者将会展开社会革命,建立这种政权。可是他坚持先须使劳动者觉醒,并且指出他们真正的利益。知识分子应该担任的任务就是“到民间去”,在农民和工人之间散布这真理。

拉伏罗夫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藐视民主改革,认为这种改革是次要的。他问他的弟子:“革命巨斧既能伐树,那又何必去剪枝?社会革命既将会解决一切,那么便不值得花费时间及精力在俄国倡导宪政及自由。”拉伏罗夫勉励追随他的人,即使他们目前只有十个也不足为虑,明天便将有一百人,一月之内便会有千人。在老百姓之间从事宣传便可以达成社会革命,因为俄国农民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的倾向”,密尔制的农民村社与劳动组合以及各宗教派别的独立精神,都是良好例证。拉伏罗夫的民粹主义与赫尔岑革命先驱主义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

拉伏罗夫对于宗教或科学上的宿命论概予排斥。他强调个

人在历史上的创造角色,从当代一般人的道德感上来着手。后来虽对马克思之经济社会主义许多观念以为然;但是却从未接受马克思对于历史过程之解释。他认为阶级斗争、经济冲突、有与无者利害关系之对立显然十分重要,然而必须顾虑到人生及心理上的其他因素。未来政权不但是经济上的必要而且在道德上也有其理由。社会主义必须有其伦理根据,对自由、正义、友爱,以及个人之调和发展均有裨益,而且定须经过革命以达成,因为如不经过斗争,统治阶级永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力。这种观念使得拉伏罗夫自称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分子,俄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运动就此展开。

拉伏罗夫派深为宗师个人主义化的伦理观点所感动,纷纷以大众教育教导老百姓为己任。巴枯宁派人士所激烈批评的也就是这些方法。

米切尔·巴枯宁(一八一四——一八七六年)为在欧洲劳工运动居领导地位的第一个俄国革命分子,国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曾经参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后被奥地利政府递解回国,被禁锢于圣彼得与保罗堡监狱中,其后又被流配西伯利亚,一八六一年脱逃重返欧洲,从事煽动罢工暴动凡十五年,参与各式各样的阴谋,并在欧洲各处,尤其是拉丁及斯拉夫国家成立激烈的工人团体及革命会,差不多破坏了第一社会主义国际,他是马克思的对敌。深信世界革命在即,并且致力准备革命之来临。他否认民主制度对劳动阶级完全解放之重要,而只承认国家与革命两种相对力量之存在。他始终认为毁灭欲即创造欲。要毁灭旧世界才能开始建立任何新秩序。他主张立即煽动群众的叛变之念,“到民间去”也是他的口号,然而却劝追随者勿信拉伏罗夫派缓慢的宣传法。

中上层所以意欲协助贫苦,不但是出于怜悯,而且是由于良心不安自觉罪过。他们惭于自己之社会地位与富裕,渴想为他们的出身和教育所享的种种便利来赎过,力求脱离他们的阶层。俄国社会改革者与革命分子类如佩斯特尔及托尔斯泰与巴枯宁、列宁等都是出身良好。他们不但有这种报答社会的作风而且深望有“纯洁”的生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男女对于牺牲有差不多等于自残似的热诚,他们的政治活动具有一种心理郁结的现象。他们创造了一个神话。许多年轻极端分子,不管是拉伏罗夫还是巴枯宁,都把农民当做理想人物,具有和善、智慧与忍耐的种种美德;他们深信老百姓准备参加他们种种社会主义化的奋斗而且拥护他们的革命梦。

“为人民服务”成为一个悔过的贵族的口头禅;可是当中下阶层知识分子运用这个口号时,它便更具真切性。贵族出身的理想主义者经常与中下阶层知识分子混在一起。出身虽有高低,心理上之动机虽有差别,可是他们仍然能够合流致力于“到民间去”!这是他们所认为的社会意识的崇高的表现。他们希望贯通受过教育的人与工人之间的鸿沟,消除俄国历史上的基本罪恶。

民粹主义分子在这方面是力求实践复古派的梦。一八三〇年及四十年代关于老百姓的偶像观念还只是理论,还只不过是民族意识觉醒之后所产生出的一个庞大的乌托邦计划的一部分。民粹派对于老百姓有乌托邦化的幻想,这些幻想后来酿成悲痛的结果;可是他们言行并重,开始实践他们的计划。从俄国知识分子的演变来说,他们之“发现”老百姓以及他们之去和农民正式接触,实在是一件最重要的大事。俄国人民两大组成分子,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关系问题初次成为具体的命题而不

再成为抽象的问题。这就是民粹运动在历史上的真正意义。

二

各处的秘密小团体都纷纷讨论老百姓的自由与幸福,全国数以千计的青年男女同时得到一个结论,他们要和老百姓共流血汗,他们要使农民以及工人受到社会主义宣传的启迪。理论上的揣测不久便成为实际结论。从实际结论而转为一种如火如荼的运动。许多政府官员、地方官、军官、医生及教师等也都受到感召。

一八七三年时若干贵族也参与这个运动。克鲁泡特金亲王成为刷墙匠。莫斯科都督之女,索菲亚·皮罗斯卡雅在乳酪厂做工。以革命见称的卡塞琳·布里希斯卡雅,和托尔斯泰在《神与人》一书里所影射的富翁里索哥夫,以及其他数以千计的人士统统去乡下与农民住在一起;可是这种集体牺牲的收获似乎很小。民粹派分子彼此没有联系,老百姓态度仍然冷淡,甚至于敌视他们所宣传的。当局对这些民粹派分子又加以种种迫害。于是民粹派分子乃决定团结起来成立一个雏形的政党,党的名称也就是他们的口号:“土地与自由”。他们的目的则仍然是以宣传而推动革命。这数千名积极分子再加上许许多多同情者,已经开始讨论政治民主为社会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先决条件的问题。

这个新政党要比以前的民粹派分子激烈得多。“土地与自由”党不但密设印刷厂,成立各执行部门,而且还有协助政治犯逃出西伯利亚及其他地方的别动队。总指挥是一个中央委员会,他们再度到乡村与工厂里去活动。

可是他们虽然使用新手段而且获得舆论的道义支持,然而

亦未能如愿以偿。政府的对策使得他们许多的良好计划失败。在民粹运动进行的六年中被当局逮捕及流配的有一万七千多人。“土地与自由”党乃觉得有改变策略之必要,他们内部也已有激烈内讧。巴枯宁派主张采取更激烈的直接行动,该派若干分子竟确实在乌克兰组织叛动。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资本论》系一八七二年在俄国出版),建议在工人之间加强宣传(南俄工会及北俄工会等都已经入党),另有若干激烈分子则声称专制政治没有真正社会基础,是站不住脚的,一批坚决的革命分子可以夺取政权然后发施号令实行改革。简而言之,一八七六年时,理想主义派的宣传家的地位已经由更为激烈的人士取而代之,这些激烈分子是准备以武力和当局斗争的。

俄国当局一方面下令所有政治犯概受军事法庭审讯,另一方面设置秘密警察,具有广泛权力,实际可以控制全国,这些措施的作用适得其反,徒使民粹派更为愤恨,而且加紧恐怖活动。

民粹派不得不承认他们目前的主要敌人专制政治,除非推翻沙皇政权,否则俄国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之可能。因此拉伏罗夫不甚置理的和巴枯宁嗤之以鼻的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乃落在民粹派身上。他们现在的论调是政治革命与民主自由只是趋向社会主义过程中之一段。

有一点殊为重要,这就是民粹派把民主政体并不当做一个目标而只当做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办法。他们所以愿为民主奋斗,只为的是如此易于达成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其他国家内所产生的争取政治民主奋斗是资产阶级领导及支持的。在俄国却是社会主义分子无可奈何地进行政治斗争,当他们最后深信必须担负起本该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时,便不得不使用武力与革命策略。

一八七九年经济学派与主张争取政治改革人士在民粹派领袖的秘密会议中发生摩擦,结果乃有分裂。正统民粹派成立了昙花一现的重分黑土党(Black Division),参加者有普列汉诺夫以及忠诚于纯社会主义的其他人士,他们后来便参加马克思派。他们认为人民的权利、政治自由、普遍选举权等并无眼前的重要性。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者徒然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因为在一个民主政权之下资产阶级将获得利益,而这种利益却是大部分使工人蒙受不利而得来的。与他们对敌的人士在日里雅波夫、米海洛夫等领导之下成立了有名的民意党(Party of the People's Will)。他们说社会主义者在俄国政治斗争中的领导是必定会有重要结果的。只要民意党在劳动群众支持之下指导争取自由的斗争,那么专制政体终不免要崩溃,一旦崩溃即可以展开庞大的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则为社会主义土地改革。

民粹党人的主要改良是策略,他们决定展开破坏及恐怖活动,消灭统治阶层中最令人憎恨的人士,杜绝密探之活动,惩罚特别专横暴虐、滥用职权的官员,这些活动旨在破坏人民对于皇权的信念而且继续证明反对政府并非不可能,藉以引起人民的革命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民意党的性质比较更近乎一个修道会,而不似西方国家的政党。有些史家认为这一点可以反映俄国人心智的本质。

俄国人使得他们的政治斗争含带一种宗教热忱,一种至上而且自我消灭的笃诚精神,而且往往有一种西方传统所没有的拜占庭化的刻板思想与教义。恐怖作风问题在民粹派看来不仅是政治机会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引起心理上尖锐矛盾的道德问题。每个恐怖分子在采取最后决定以前必须经过一番很痛苦的

精神折磨。大多数党员都觉得他们的杀人权利是以视死如归的精神换来的,成为一个恐怖分子表示在精神上与肉体方面有所牺牲;他们必须排除一切怀疑,克服恐惧与怜悯,舍弃家庭、爱与安全,一心一意致力于一个凶狠的目标;他们所过的是被人四处搜捕的生活,遭受强敌迫害,处处均有危险;可是史家撰写俄国革命中这个阶段时未能强调这些为了追求社会主义理想而致力于恐怖手段的分子,不但具有宗教热忱而且还有很锐利的实际头脑。他们资源有限,障碍重重,却能成立一个庞大组织;有印刷厂、制造炸药工厂、特别的开会地点、密码、监视机构、造假护照的部门等等。一八七九年八月执行委员会决定处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其后一切努力便集中在消灭沙皇。

一八七九年与一八八一年间党人曾经数次谋刺,沙皇专车经过的地方有地雷爆发,冬宫御膳厅中有定时炸弹爆炸。同时又有政府官员被杀害。当局虽然动员所有警力,展开大规模行动,逮捕及流配了数以千计人士,并且处决数人,然而党人的秘密执行委员会仍然与政府斗争。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仿佛是惊弓之鸟,每天晚上总换寝室,一时施行报复政策,一时又准备从事改革。冬宫御膳厅被炸之后,他便以镇压革命分子运动授权予罗力斯·麦力科夫将军。这位将军一方面拟定一个宪政改革计划,另一方面继续以铁腕镇压社会主义分子。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的街上被恐怖分子以炸弹炸死。

刺死沙皇虽然完成了社会主义分子的最大目标;可是他们本身也因此遭受致命打击。执行委员会的三十六名发起人中有索菲亚·皮罗斯卡雅、日里雅波夫等五人被处绞刑。列夫·托尔斯泰及哲学家索罗维夫等上书给亚历山大三世呈请宽恩;但是

并无效果。此外另有一名神经错乱，十二名死于狱中，其余的则被发配往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三

刺死亚历山大二世对革命党人可以说是个得不偿失的胜利，并未达到他们的期望，没有引起民众们的响应。当权者仍然严酷若昔。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主张中庸态度的麦力科夫将军与死硬派领袖、宗教会议主席波别敦诺斯采夫(Pobyedonostzev)两人之间略事犹豫之后，卒采纳波别敦诺斯采夫的意见，以激烈手段对付革命党人。波别敦诺斯采夫表面上俨然有基督徒之谦和，实际上为人尖刁，爱好权势。他就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大宗教裁判官一样(或许就是以他为蓝本而写出的)，深信人性本劣，可以干一切坏事，文化与理智都是没有用的，他主张以钳制与恐惧维持现状。

他认为俄国人都有叛徒天性，因此革命的危险确实很大，除非教会及政府以联合的权威控制人民的肉体及灵魂。于是他在乡村设立教区小学，以教义问答为基本课程。反对科学的教育部长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Count Dmitri Tolstoy)则决定在中学里与破坏思想斗争，规定以拉丁文与希腊文为主的课程而且实行严厉检查制度。他的继任人物，戴连诺夫(Delianov)则于一八八七年命令高级中学不得录取车夫、仆人、洗衣女、小杂货商、厨师等人的儿子，除非天资特别高。一八八四年各大学都丧失学术自由，教授多人悉被解聘，当局又采取特别措施阻止女子受高等教育。

沙皇政府这种对内政策受有地产的贵族公开拥护，这些贵

族获得当局的经济资助,从贵族中委任的乡间治安官员则具有广泛行政权力,恣意鞭挞反抗的农民。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国内气氛是令人窒息的,受过教育的人士都患有道德上的衰弱症。整个俄国似乎是听凭观念狭窄的官僚政治支配,一般人也都昏昏庸庸地随波逐流,从一八八〇到九〇年这十年对俄国之经济发展也有决定性影响。农民依然过得很苦。九百万户农家中有一百五十万户连一匹马都没有。更穷的农民大都以极低工资替人佣工或则在他们小得可怜的土地上挣扎。世界小麦市价之下跌使得农业情况更为严重,广大地区天旱与歉收成灾。一八九一到九二年发生饥荒的灾区内人口有三千五百万之多,饿死以及患瘟疫而死的农民以数十万计。乡下贫民乃不得不投奔城市,那一时期的工人因此差不多都是最为贫穷的农民出身。俄国的工业生产则不断增加。迨至一八八七年产值十五亿金卢布,全国铁路大为扩展,纺织业、钢业及煤业也都有很大进展。

这些发展一方面使得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改变,另一方面对于君国主义思想也不无作用。死硬派人士倾听梅舍尔斯基亲王(Prince Vassily Meshersky)的言论,他的政治论文及小说在上流社会中十分流行,喜欢思想新颖者则拜读列昂切夫(Konstantin Leontiev 一八三一——一九一年),列昂切夫是地主出身,后来抛弃极有希望的外交官前程而入修道院。他撰有小说、故事及文艺、政治性散文多篇(包括论托尔斯泰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若干篇,其艺术观点异常精辟)。近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著有《东方》、《俄国及泛斯拉夫世界论集》,发挥他的宗教与政治见解。他有美学、宗教与科学凝合而成的一贯哲学,尝谓:“神秘主义只为信者而立,伦理与政治乃为人谋。生物学系